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维度是以人与自然的统一为基本前提, 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基本原则,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旨归。因此, 新质生产力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逻辑前提, 其实质是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 创造美好生活。绿色发展是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统一, 必须整体推进、协同发展, 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以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倒逼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必须在塑造新型生活主体、消除日常生活异化、促进绿色低碳消费以及规范日常生活行动等方面发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4)04-0027-08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4.04.007

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极具时代特征的重要概念。2024年1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阐述, 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同时, 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1]“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是“新的生产力理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内在地包含着“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统一。因此, 加快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便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的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维度是以人与自然的统一为基本前提, 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基本原则,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旨归, 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

1. 新质生产力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逻辑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 生产力是人的劳动能力, 是人

[作者简介] 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研究”(项目批准号: 22BKS069)、湖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功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 22ZD080)。

们“有目的的生产活动”^[3]即物质生产活动，其主要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4]在任何时代，生产力的运用都涉及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基本关系。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质、物化现象及其被占有的发生机制的揭示和批判，还是对未来理想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展望，都以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揭示为重要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了人“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5]“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呼之欲出。其实，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界的一体性”。作为一种实践关系，“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具体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二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人类进行有目的的物质生产活动，必须“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7]将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统一起来。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对“人与自然界一体性”思想的创新发展，其核心要义是“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告诉我们，自然界是人类之母，而自然资源有限，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因此，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或物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尊重自然界发展规律，取之有时、取之有度，“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9]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正是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指导下，新质生产力取代“新兴生产力”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如果说“新兴生产力”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

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那么，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既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又保持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实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

生产力作用于自然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物质变换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体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人通过“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创造满足自己需要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人通过“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并“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同时，也在“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1]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动态平衡。人和自然的动态平衡既是合理的物质变换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基本要求，因而，不同的生产力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同的结合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物质变换。西方现代化之所以是“文明面”和“野蛮面”的矛盾统一体，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逻辑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一种异化的方式结合，“新兴生产力”成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工具，将人与自然置于统治与被统治、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地位，从而造成物质变换的断裂。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和谐有序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构建了一种未来社会理想的物质变换方式：“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2]尽管这个理想仍很遥远，但这是新质生产力创生的初衷及其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结合，以人与自然共

生关系为前提,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实现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创造了生产力新形态。在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通过发明和应用先进绿色技术,以合理的方式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既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又不破坏自然界的平衡与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而,“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13]只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持续优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而科技创新是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生产力中,科学技术是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14]科学技术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5]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工业化为本质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催生了工业革命,从而推动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现代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科学技术直接或间接推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6]的观点。科学技术通过渗入并改造生产力的诸要素,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物质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要素的质量,并使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即劳动者成为“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17]还扩大了劳动对象的类型并赋予其新的特性,这样科学技术使物质变换在质和量方面都得到了全面提升,在质上丰富并优化了物质变换的内容,在量上表现为巨大物质财富的创造。

科学技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第一

次”“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18]当科学技术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时,它便成为征服自然的锐利武器,物质变换的断裂、“人的生命力”和“自然界生命力”的双重枯竭便在所难免。只有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新型生产关系中,科学技术才能赋予生产力以真实的文明性,实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性跃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已悄然展开,产业变革正加速推进,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创生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而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中,科技创新的底色是绿色,是绿色科技革命。科技创新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围绕着绿色、生态、低碳等创新发展科学技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具体而言,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是以绿色科技革命赋能生产力诸要素,形成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工具,并实现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从而破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生共荣之路,实现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历史性跨越。

二、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相互促进

全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而高质量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统一。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内含着加快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要求,必须整体推进、协同发展,以绿色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以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推进绿色发展。

1. 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强大动力

在唯物史观中,生产方式主要是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质生

活的生产方式”与“直接生活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是由一定物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即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生活方式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指人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19]即人的存在方式,而“人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0]内含着生产方式;后者是指“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21]即“为了生活”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2]亦即消费方式。这里使用的生活方式是狭义的。关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马克思有两个重要论述:一是“生产生产着消费”;^[23]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4]尽管“生产”不等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但在这里具有相同意义。从再生产的过程来看,“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而消费“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25]这两个重要论述对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生活方式变革的根本动力。

新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构成了新时代的绿色生产方式。正像发展不等于生产一样,绿色发展方式比绿色生产方式的内容更丰富、深刻,但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主要是指绿色生产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表述为“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产方式”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绿色生产方式内蕴着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产方式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这是加快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基本路径,从而彰显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实意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在于从生产端发力,提高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质量和效率,突出“质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26]因此,提供丰富、质优的绿色产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和引领生活方式的变革,便成为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

2. 生活方式制约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倒逼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是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也制约着生产方式,消费也生产着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27]生活方式一经产生,便有其自身独特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其内在矛盾运动既推进自身变革,也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新的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从而“创造出生产的动力”。^[28]人类之所以要进行周而复始、不断拓展的再生产,就是因为人的需要是一个没有终点、不断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29]生活方式既是生产者素质的体现,也是生产者素质的生产过程,而生产者素质状况则制约着生产方式。生产者的需要不是盲目的,而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一定目的”则是生产者素质的证明。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各不相同,不同的生产目的决定了生产者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在资本统治中,资本增殖的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生产只能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而这种生产目的是由资本的贪婪本性即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目的,决定了生产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这种生产方式必须受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物质资料生产时,从来没有脱离“生活”这个本原性要素。没有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就不可能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有新质生产力。绿色生产方式的形成不仅要从生产端发力,也要重视需求端,注重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强调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是因为需求也有一个结构性问题,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旨在于“质优”,而“质优”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由量到质的提升和内容的调整、拓展。只有强化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以高质量消费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革,从而促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共同富裕实际上包含着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或环节,即“做大做优蛋糕”和“分好蛋糕”。没有人们对“蛋糕”与“优质”的要求,“做优蛋糕”就缺乏动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共同富裕时,不仅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强调增加“收入”、扩大“消费”,在强调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时,也要求注重需求侧管理。“收入”意味着“消费”。高质量、优结构的消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是重中之重。只有消费升级与结构转型的新消费,才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相关产业、基础设施等迅速成长,从而为创生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

3. 生产方式内蕴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新质生产力体现了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统一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是相互制约的,还是直接同一的,因为生产和消费具有“直接同一性”。马克思明确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同一性”。^[30]一方面,“生产直接是消费”。生产过程是一个消费过程,既支出、消耗劳动者的能力即劳动力,也消耗生产资料。因此,生产行为本身也是消费行为,创造价值的过程也是消耗劳动力和消耗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过程也是一个生产过程,既在生产劳动者自身的劳动力,也创造新的生产的目的、动机和对象。因此,消费行为本身也是生产行为,消耗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过程也是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新的生产的需要”的过程。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同一性”是以分配和交换为中间环节的,是通过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市场交换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劳动产品只有经过分配后才进入消费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方式直接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直接是生产方式,两者具有直接同一性。因此,以整体的方式推进生产和消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

生产和消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同一

性告诉我们:一方面,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对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进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提高生产性消费的效率。当消费停留在“最初的自然粗野和直接状态”时,“那也是生产停留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31]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赖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是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形成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指出:“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作中介”,“而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32]只有这样的大众才能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只有以艺术的方式进行消费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才能实现生产与消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良性互动,才能以消费升级促进供给升级,才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三、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路径

在生产力中,人始终是唯一能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达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本在于生活方式变革,推动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美好生活实质上是一种美好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建立既以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为前提,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是一种真正的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因此,在全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1.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塑造新型生活主体

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构建,最终必然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人的素质的提升是关键。人的素质是一个复杂结构,包括知识、智力、体力以及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其中,精神文化素质居于基础性、关键性地位,是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所有措施都与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直接相关,或者说,都以人的精神文化素质为重要支撑。没有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

所有的措施都只能停留在书面上、口头上。“自然粗野和直接状态”的生活方式既与落后的生产力有关,也与人的精神文化素质低下直接相关。因此,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首要任务是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用丰富、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重塑生活主体的素质,“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

在共同富裕的视域下,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创造生活的整体性,也创造生活主体的完整性、全面性,提高生活主体的精神境界,从而使生活主体超越纯粹的物质生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因此,追求共同富裕,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33]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审美素质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塑造新型生活主体。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厚植创新精神。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而创新精神是新型生活主体的精神特质。没有创新精神,就难以形成创新能力;没有创新能力,就不可能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创新精神生成、勃发的重要基地。二是创新生活观念。生活观念是人们对生活价值、意义具有总体性的看法和观点,它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超越生活现实为目标,是决定和引领生活取向、生活态度的精神力量。实现生活方式绿色转型,首先是一个创新生活观念的问题,而创新生活观念需要精神文化力量。只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培育和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才能摒弃以丑为美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生活观念,确立真善美相统一的绿色健康消费观念。三是端正生活态度。生活态度是生活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化,集中体现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价值选择以及思想倾向。生活是一种态度,只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才能彰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4]这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态度是一个涉及文化蕴涵、精神境界的问题,需要精神文化的涵养,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而健康、优秀的文化作品是精神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具有广泛的

传播性。当然,精神文化生活本身也是一种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是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

2. 有效把控资本逻辑,消除日常生活异化

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一直是资本逻辑深耕细耘之地,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是资本增殖自身的必要条件,因而,现代生产力具有资本属性,资本逻辑是现代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35]而为了创造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逻辑必然扩展至整个社会生活,不断拓展商品市场,从而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因此,理解资本逻辑有两个重要维度:一是生产力维度。资本逻辑使“疯狂地发展生产力”成为必然,只有“疯狂地发展生产力”,才能从自然界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并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二是日常生活领域。在日常生活领域,不断地“制造”消费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制造”的消费不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需的消费,而是欲望消费,是消费异化。由于消费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因而,消费异化实质上是日常生活异化。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认为,消费异化是“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36]实际上,本·阿格尔所讲的消费异化只是一种“粗陋消费”,而在当今社会,消费异化往往呈现为一种“精致主义”的面孔,是一种“想要的”消费,其实质是物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宰,人被物所统治或奴役。

因此,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要旨在于消除日常生活异化,而消除日常生活异化的根本在于有效把控资本逻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能没有资本,资本仍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仅仅是手段,而绝不是目的,这样,有效把握资本逻辑便成为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作为现代生产力的最高形式,新质生产力不能没有资本的助力,但核心逻辑不是资本逻辑,而是创新逻辑和人本逻辑,这也正是新质生产力超越“新兴生产力”的根本之处。重要的是,要防止和克服资本对日常生活的过度浸淫。日常生活领域不可能与资

本彻底“绝缘”，资本可以为日常生活的丰富提供条件，但资本逻辑绝不能成为日常生活的逻辑，而是相反，要使人的发展逻辑成为日常生活的逻辑。尤为重要的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警惕精神文化生产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资本化是当务之急。文化生产与文化生活一旦落入资本逻辑的泥潭之中，任何试图超越现实的努力都将毫无意义，日常生活的不堪必然导致人的主体性沉沦和精神世界的荒芜空虚。

3. 增加绿色产品供给，促进绿色低碳消费

增加绿色产品供给是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基本路径。生活的基本内容是消费，是衣食住行等需要的满足，而消费必须有消费的对象或内容即产品，不同的产品供给会导致不同的消费，绿色产品供给有助于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绿色产品是指综合具有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特点的产品，亦即生产与消费对生态环境不造成破坏的产品。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新质”之所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丰富的绿色产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37]近些年来，绿色生活的价值理念虽然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但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仍然任重而道远，一个重要原因是绿色产品的量和质均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因而，以科技创新为绿色产品增量提质便成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生产丰富质优的绿色产品，越来越离不开文化的因素，甚至可以认为，高品质的绿色产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总和。马克思指出，虽然生产力主要是指物质生产力，但“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38]发展生产力包括发展精神生产力，而且，

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从来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新质生产力中更是融为一体、形成“合力”。因此，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产丰富质优的绿色产品，精神生产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在任何时候，物质生产都有文化的参与，物质产品都包含着文化的因素，在今天更是如此，文化构成了物质生产、物质产品的内在规定性，物质产品虽然具有物质的具象，实质上却是文化产品。与此相适应，生活内容也不再是纯粹的物质生活，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浑然一体。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中的“绿色”，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是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业态，是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支撑。生产丰富质优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不断丰富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产业的时代使命。

4. 创新绿色生活制度，规范人的生活行为

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扬弃，而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涉及人的利益，即原有的消费方式受到了限制，是一场革命。因此，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实际上是一个生活治理或社会治理的问题，仅靠人的自觉是不够的，还要靠制度。国内学界在对西方“国家—社会”思维模式或治理模式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生活”的思维模式或治理模式，为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借鉴。英国学者佩蕾丝认为：“制度领域是每一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一般思维地图所盘踞的地方。它也是标准、法律、规则、监督机构和负责社会治理的整个结构所组成的网络。”^[39]生活领域当然是制度的重心所在，只有通过制度规范与保障，生活才能有序、和谐并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础。因而，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必须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即绿色生活制度。绿色生活制度即保障绿色生活和谐有序的制度，它既蕴含在各种正式制度甚至法律法规之中，也是保障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专门制度。

创新绿色生活制度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增加制度供给，为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供制度支持。在总体上，制度都具有生活的维度，或者说，制度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倡导”，而是必须予以制度的强力支持，以制度保障加快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因此，从总体性的国家制度安排到具体的制度设计都要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体现美好生活的价值指向。二是以制度规范日常生活行为，培养公民的环境“公共理性”。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是公共生活，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和生态的失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就是公共生活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制度的重要功能是通过限制的方式引导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近些年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但实际效果仍有待提高，其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优势没有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的约束作用发挥不够。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必须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对日常生活中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决不手软、决不姑息，使制度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0]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具有直接同一性，体现了“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统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以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为前提；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必须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动力。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对于每个人而言，加快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开展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理性消费，既是不可让渡的权利，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参考文献：

[1][2][13][3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

[3][4][10][11][14][15][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2009：59，207，207-208，208，53，698，26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6][19][20][21][22][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520，525，530，531，520.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8][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55，146.

[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4.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8.

[18][23][25][27][28][29][30][31][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6-357，16，18，15，15，16，31-32，16，16.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2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44.

[3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

[36][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译者：慎之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96.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

[39][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译者：田方萌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9.